

数字劳动的生成逻辑、本质意蕴与时代审视

■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佟春丽

在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的今天,数字劳动已成为数字经济最基础、最活跃的生产活动。从平台用工到算法研发,劳动的场域、工具、对象与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革。数字劳动是生产力发展到数字阶段的必然产物,其生成过程印证了马克思关于“劳动资料的变革推动劳动方式变革”的基本判断。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分析框架,厘清数字劳动的生成与本质既是回应时代之问的理论课题,也是规范数字经济、保障劳动者权益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要求。

一、聚力赋能,三重合力催生数字劳动

数字技术体系为数字劳动提供物质基础。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移动互联网、区块链与5G通信构成新一代智能体系,将传统劳动资料改造为数字化工具,把劳动对象拓展至非物质要素。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,算法成为核心生产工具,网络平台成为新型劳动载体,劳动突破物理空间限制,呈现在线化、去中介化特征。马克思笔下“机器体系”在数字时代升级为“智能机器体系”,数字劳动正是这一体系下人类劳动的新形态。

资本逻辑扩张推动数字劳动规模化发展。数字资本以平台为组织载体,以数据为核心资源,以算法为治理手段,追求更低成本的剩余价值。平台资本将线下劳动线上化,催生外卖配送、网约车、直播电商、众包标注等大量数字劳动岗位。资本通过技术遮蔽,把劳动过程拆解、分散甚至外包,在降低组织成本的同时,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精准控制与价值攫取,使数字劳动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主要依托。

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数字化需求拉动数字劳动持续扩张。数字消费、服务、治理全面普及,信息交互、精准匹配、智能决策成为刚性需求。用户行为、社交关系、商品交易痕迹数据持续产生,需要大量数字劳动者进行采集、清洗、标注、运营。数字劳动从专业技术岗位延伸至普通用户的“使用即劳动”场景,用户在浏览、分享、评论中无偿贡献数据与注意力,形成有酬数字劳动与无酬用户劳动并存的格局,共同构成数字经济的劳动基础。

二、守正溯源,经典理论诠释数字劳动

数字劳动在形式上高度新颖,引发“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”的讨论。回到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与价值源泉原理可明确:数字劳动形式变而本质未变;表象变而规律未变,依然服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法则。

数字劳动并未改变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一核心命题。数字产品服务价值由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,算法、模型等物化劳动仅转移旧价值,不创造新价值。即便是生成式AI或自动化系统,其架构设计以及迭代优化均凝结大量人类抽象劳动,所谓“智能生产”背后仍是人的劳动支配。马克思揭示的“抽象劳动形成价值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”原理,在数字时代依然有效。

数字劳动鲜明体现劳动二重性。在劳动

层面,劳动者运用数字工具对数据进行编码加工,生产出具有特定功能的数字产品与服务,创造使用价值;在抽象劳动层面,劳动者脑力与体力的耗费形成价值实体,支撑数字商品的交换与流通。数字平台信用评分、精准推荐既是具体数字劳动的有用成果,也是抽象劳动凝结的数字载体,商品二重性依然源于劳动二重性。

数字劳动拓展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边界。在数字资本关系下,受雇于平台、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数字劳动是典型的生产劳动;用户无偿提供数据与内容的劳动,虽不直接形成雇佣关系,却参与数字资本的价值形成与增殖过程,成为非雇佣型生产性劳动。这一形态丰富了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,也揭示出数字剥削从传统雇佣关系向更广泛社会场景延伸。

三、直面新局,时代视角审视数字劳动

一是劳动形态更趋智能化与非物化。数字劳动以脑力创意劳动为主,衍生出数据标注、内容审核、算法训练等新兴数字岗位,劳动复杂度与知识性提升,劳动对技能与数字素养的依赖显著增强。

二是劳动过程更趋碎片化与去边界化。平台算法将任务拆解为微小单元,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、工作场所与生活空间高度融合,

随时随地劳动成为常态,也导致劳动边界模糊。

三是劳动控制更趋算法化与隐蔽化。数字资本以数据监控实施精细化管理,例如评分体系、派单机制、奖惩规则,在劳动者自主性提升的同时,面临更强的技术规训,劳动过程的强制性被技术包装,剩余价值攫取更隐蔽。

四是劳动者权益更趋脆弱化与弱化。平台用工多为灵活就业,劳动关系认定难、社会保障覆盖不足、职业伤害保障缺位、议价能力弱等问题突出,数字劳动者面临就业不稳定、收入不确定、权益难保障的困境。

四、结语

数字劳动是人类劳动的新形态,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,而是对其时代化拓展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,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,在尊重劳动的同时规范数字资本行为,保障数字劳动权益,推动数字劳动可持续发展,让数字经济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富裕,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坚实力量。

基金项目: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”,项目编号:CYX25084

从“修齐治平”到“时代新人”——

儒家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

■三峡大学 杨乐怡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源泉,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,其“修齐治平”的递进式价值脉络,与新时代“有理想、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肯奋斗”的“时代新人”培育要求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。在此背景下,将“修齐治平”思想有机融入高校思政教育,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,既是打造“大思政课”的重要举措,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。

“修齐治平”思想历经两千余年积淀,构建起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的完整责任体系,需经去粗取精的现代转译——剔除封建等级依附等时代烙印,聚焦其“个人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”的递进逻辑与责任内核,这与“时代新人”培育要求形成精准对应。

其一,“修身”对应“有理想”,强调通过品德修养坚定内心信念,引导青年明辨是非、坚守正道,将个人理想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之上;其二,“齐家”对应“能吃苦”,倡导以包容、担当的态度处理家庭关系,在敬老爱亲、分担责任中锤炼坚韧品格,为直面人生挫折、承受奋斗压力奠定基础;其三,“治国”对应“敢担当”,延伸为立足社会岗位的责任意识,引导青年将家庭责任升华为对集体、行业的担当,在专业领域勇挑重担、攻坚克难;其四,“平天下”对应“肯奋斗”,升华为胸怀家国的使命追求,激励青年以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抱负,在

民族复兴征程中务实笃行、不懈奋斗。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简单复刻,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,将传统责任观转化为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坐标,明确“修齐治平”在思政教育中的“文化滋养”定位,不偏离核心育人方向。

当前,国内学界对儒家思想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,但“修齐治平”思想的融入过程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。其一,认知片面化,部分高校或将其等同于传统文化知识传授,仅讲解“修齐治平”的字面含义,忽视价值引领功能,或过度复古化解读,未能实现现代转译;其二,内容碎片化,“修齐治平”多以专题讲座、选修课形式呈现,未与思政主干课程深度融合,缺乏对递进逻辑的系统梳理,难以形成循序渐进的育人效果;其三,方法单一化,仍以传统理论讲授为主,实践教学局限于经典诵读等静态形式,数字化手段运用不足,难以契合青年思维活跃、注重体验的认知特点;其四,机制缺陷化,思政教师对“修齐治平”的现代内涵挖掘能力不足,评价体系偏重理论考核,对学生责任实践、品德修养的评价缺失,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尚未形成;其五,衔接断层化,“修齐治平”与现代社会场景脱节,如“齐家”理念如何适配独生子女家庭与多元家庭结构,“治国”“平天下”如何转化为大学生感知、可践行的日常行动,缺乏具体路径设计。

破解上述难题,需紧扣2026年全国两会关于深化“大思政课”改革、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要求,立足高校育人实际,从课程、实践、环境、机制四个维度构建系统化融合路径,强化“修齐治平”与“时代新人”的对应落地。

课程体系重构是融合的基础。在《思想道德与法治》等主干课程中增设“修身与理想信念”“担当与家国情怀”等专题模块,如结合“修身”解读新时代青年品德修养的具体要求,通过“治国”“平天下”的现代转译,阐释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的辩证关系;开设《“修齐治平”与时代责任》选修课,引导学生深挖思想当代价值,梳理从个人到国家的责任脉络;推动专业融合,人文社科类专业聚焦“修齐治平”的价值内涵,理工科专业融入“修身务实”的科研品格,经管类专业植入“担当尽责”的职业理念,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。

实践路径创新是融合的关键。开展“修身日志”打卡、家庭责任实践等沉浸式活动,让学生在日常践行中体会“修身”“齐家”的内涵;组织“红色研学+责任践行”活动,结合革命先辈的担当事迹,引导学生将“治国”“平天下”转化为乡村振兴调研、社区服务等具体行动;搭建校园治理实践平台,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、校园公共事务,在服务他人中锤炼“担当”素养;创新数字实践载体,鼓励学生创作“修齐治平”

现代践行短视频,设计责任主题数字文创,增强参与积极性。

育人环境营造是融合的核心。结合高校办学特色,打造“责任长廊”“榜样墙”等主题景观,展示“修齐治平”当代践行案例;挖掘历史仁人志士、当代道德模范与优秀校友的责任事迹,思政教师以身作则发挥示范作用,让“修齐治平”的责任理念可视化、可感知;推动家校社联动,引导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传递责任意识,与博物馆、文化馆合作,邀请学者、行业模范进校园分享责任践行经历,拓宽育人维度。

保障机制完善是融合的支撑。加强思政教师专项培训,聚焦“修齐治平”的现代转译与思政元素挖掘,组建“思政教师+传统文化教师”教学团队;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,将学生对思想内涵的理解、日常责任实践表现纳入评价指标,采用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;整合校内外资源,建立“修齐治平”育人资源库,开发线上课程、虚拟仿真实践等数字化资源,争取政策与经费支持,确保融合工作长效推进。

“修齐治平”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丰富滋养。推动其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,需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,精准把握传统与现代的衔接点,既激活传统文化当代价值,又强化“时代新人”培育的文化支撑。高校应主动肩负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双重使命,优化融合路径,规避复古化、形式化等风险,让“修齐治平”的责任理念在新时代焕发生机,助力青年学生从“修身立德”走向“报国兴邦”,成长为兼具文化自信与时代精神的“时代新人”,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。

在当代教育体系中,思政教育承担着塑造学生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核心使命。它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,而是一个通过思想引导、价值塑造、品格培养,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和正确价值取向的系统性育人实践。

回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,思政教育始终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不同时期都发挥了独特的育人功能。

早在20世纪30年代,教育领域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用“生命线”这一形象表述,强调思想引导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。随后的教育实践中,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:教育工作必须注重学生的思想成长,离开了思想引导,知识传授就可能失去方向。这一认识为后来思政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。早期的教育探索中,通过组织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、建立规范的班级管理制度、开展深入的学生思想交流,为培养有理想、有担当的青年学子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在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的阶段,面对新的育

人要求,教育工作者们进一步认识到:思想成长与专业学习相辅相成,德育与智育不可偏废。通过系统的思政课程建设、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,有效凝聚了青年学生的思想共识,激发了广大学子投身社会建设的热情。这一时期的探索证明,当思政教育与时代需求相结合、与学生成长相适应时,就能产生强大的育人效果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教育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,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“德育为先”成为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共识,思政教育不仅没有被弱化,反而在育人体系中的地位更加明确。这一时期,面对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,思政教育为青年学生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坐标,帮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的认知,

思政教育:人才培养的灵魂底色

■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仇焕玲

为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新时代教育理念为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。通过持续深化教学改革,丰富教育内容、创新育人方式,思政教育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。在内容上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融入,大大拓展了思政教育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;在方法上,启发式教学、体验式学习、项目式实践等多样化的教育形式,显著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。

在实践层面,通过打造精品思政课程、建设校园文化阵地、拓展社会实践平台,特别是适应数字时代特点建好用好网络育人空间,思政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学生的精神世

界。理论研究层面,不断深化对思政教育规律的认识,丰富其学理内涵,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。

思政教育“是人才培养的灵魂底色”,这一判断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经过长期教育实践检验的基本经验。就其本质而言,思政教育连接着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,是完整育人过程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;就其作用而言,它在学生成长的关键阶段提供思想滋养和价值引领,为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;就其发展而言,在科学教育理念指引下,思政教育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品质,在实践中不断证明自己的独特价值。面向未来,继续做好思政教育工作,既是教育者的责任,也是学生成长的需要,更是社会发展的期盼。